



公共卫生兴起，进入福柯所指众人身体是卫生治理产物的生物政治（注：biopolitique，亦被译为生命政治）时代。”

生物政治的概念，是福柯在《必须保卫社会》的最后一讲中提出来的。他的生物政治，也就是以安全社会的名义，致力于布置、调控和干预环境问题，以实现合理治理的政治技术和设想。福柯确立了对人进行治理的一个根本性指导思想：作为调节的权力只能通过并依赖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。权力与自由并非对立关系，而是互动关系。权力的安全配置不再区分正常人与非正常人、病人与非病人，而是考察全部人口，形成案例，测定风险，消除风险，实现人口安全。把安全机制、人口、治理与政治开放结合在一起加以考量，福柯开启的政治理性批判引导人们深思：既然治理是必须的，那么我们该被治理到何种程度呢？

刘绍华写道：“人类社会永远存在以集体之名牺牲个人自由与权益的动机。那么，如何维持两者之间那条红线的位移平衡，是社会必须保持警戒与关注的焦点。”

疫病一起，国家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体系会率先动作，而

重点是隐含着权力关系的现代卫生制度，在忙于战疫的同时，也应该搭配相应的监督和制约系统，使整套机制更成熟，以免民众的实际诉求在屡屡扩充、层层递进的行政命令下被忽视。如此，当病毒卷土重来，人们能够相对冷静，相对体谅，恢复比较有秩序感的行为。

激情与理智

毋庸置疑，因为疫情之故，被“关”在家里的中国人，将互联网当作了主要的消磨时间的平台，由此，特别是牵扯到疫情的任何一个话题，都更易迅速成为焦点，关注度成倍扩大。

总之，在新旧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下，我们看到了舆论场域里，各种“单向度的力量”，无形中压抑了不同个体的真实感受。一些具有相同观点、相同思维体系的人，宛若紧密而团结的群体，且情感也近乎“同质”了。关心什么、真相是什么、爱什么、恨什么，在他们那儿，好似自有“规范”。于是，甲方在质疑，

2003年5月12日，小汤山非典医院里医护人员正在对患者实施抢救。

